

《大陆报》视域下近代温州早期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探析

金黎希

温州商学院

DOI:10.12238/er.v8i11.6571

[摘要] 本文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 1925至1938年间的温州相关报道为核心史料,结合地方文史研究,系统梳理了近代温州在航运贸易与实业发展两大领域的变迁轨迹。文章聚焦于温州港口管控、船舶往来、工业转型及商业变迁,通过分析外媒视角下近代温州的开放实践与发展困境,揭示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港口驱动、民间主导、中西调适”的独特特征。研究提炼出开放包容、自主创新和灵活调适的文化基因,为理解近代沿海城市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历史镜鉴,并为当代温州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大陆报》; 近代温州早期现代化; 航运贸易; 实业发展; 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 G255.3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Genes of Early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Wen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a Press

Lixi Jin

Wenzhou Business Colle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relevant reports on Wenzhou from 1925 to 1938 in The China Press as the core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combines lo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changes in the two major fields of shipping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Wenzhou.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rt control, ship traffic,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mercial changes in Wenzhou. By analyzing the opening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modern Wen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media, it reveal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port driven, folk led, and Chinese Western adjustment" in its early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has extracted cultural genes of openness, inclusivenes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flexible adaptation, providing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modern coastal cities and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enzhou.

Keywords: The China Press; Early modernization of Wenzhou in modern times; Shipping trad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me

1 《大陆报》中的温州叙事价值

1.1 史料背景与研究意义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与内部变革力量的交织下,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报刊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研究近代社会的珍贵资料。《上海地方志》第41卷中记载孙中山先生作为早期现代化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集资并授权美国人密勒(Thomas F. Millard)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美式综合性英文报刊——《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打破了英式报纸的垄断。自1911年8月发刊起,《大陆报》(1911-1949, 190000余版)关注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革。通过“Wenchow”在ProQuest近现代中国英文报纸库中检索,发现《大陆报》(1925-1938)中有4941条相关“Wenchow”的信息,除去4006篇无标题文本,还有935篇与温州直接

或间接相关的英语新闻史料文本,内容涵盖港口管理、商业活动、社会事件等,填补了温州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外文史料稀缺”的空白。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独特角色。1933年7月《申报月刊》就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道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一直受到持续关注,而温州作为改革开放“温州模式”的发祥地,其早期现代化更是值得关注^[3]。近代开埠之后,温州逐渐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教育等方面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通过对《大陆报》中温州相关报道的挖掘与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近代温州在复杂历史背景下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在近代化浪潮中的独特经历与内在逻辑,为丰富地方史研究、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提供重要支撑^[1]。

1.2 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的研究始于对原始文献的系统梳理。首先，通过ProQuest数据库检索1925-1938年间《大陆报》中涉及“Wenchow”的报道，对其进行批量下载与初步筛选，最终选取160篇核心报道进行“英译汉”翻译，形成较为系统的共计19万余字的编译资料集。在此基础上，对编译资料进行数据整理与编辑，按照报道时间、核心内容、涉及领域等维度进行分类，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的史料基础。

在史料整理完成后，采用“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还原”的方法，将《大陆报》报道分为两大类：航运贸易与港口治理类以及工业转型与实业发展类。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原理，现代化可以分为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经济工业化和专业化、社会城市化和流动化、个人开放性和参与性、文化理性化和普及初中教育等^[2]。因此，不论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还是温州早期现代化的研究，都应着眼于更多元的现代化。而《大陆报》作为新闻报纸，恰恰涵盖了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等多元范畴。本文聚焦温州早期现代化多元理论框架，围绕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文化理性化等核心维度构建，各维度相互关联，共同勾勒出近代社会转型的复杂图景，构建“港口—产业—社会”的分析体系。

2 航运贸易与港口治理：近代温州的开放窗口

2.1 港口管控与战时经济

《大陆报》对温州港的报道集中体现了“军事防御与商业功能的矛盾”。1938年6月9日报道称，温州实施“严格进出限制”，经授权的汽船停靠数量仅为离港船只的三倍，且禁止香水、高档布料等奢侈品进口（《编译》，第1篇）^[4]。这一管控措施与宁波形成对比——当时宁波因大米短缺拟重开港口，而温州作为浙江南部重要港口，其管制政策更多服务于抗战防御。这反映了在战争背景下，温州港口的首要功能已从纯粹的商业贸易转向了战略物资的管控与军事安全。这种由战争引发的管制，不仅影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也间接反映了温州在抗战时期作为后方补给线和战略要地的地位。奢侈品的禁运，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外汇，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战时经济下物资分配的优先次序，即民生必需品和军事物资优先，非必需品则受到严格限制。

港口管控直接影响航运效率和物资流通。例如，1934年11月13日的报道也提及，由于大雾，中国航空公司的新飞机“广东号”在温州受阻，甚至需要返回温州，这反映了自然条件对航运的影响，以及在特殊时期，即使是航空运输也可能受到港口条件的制约（《编译》，第57篇）^[4]。这不仅是自然因素的干扰，更是在战时背景下，任何交通中断都可能对物资运输和军事部署造成影响，从而使得港口管控显得

尤为重要。温州港的这些限制措施，无疑对其作为对外贸易口岸的商业功能造成了冲击，使其在一定时期内更多地承担了军事和战略物资转运的任务。

2.2 航运线路与船舶往来

《大陆报》详细记录了往返温州的航运线路和船舶动态，揭示了温州与国内外主要港口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航线和长江流域的内河航线。温州与上海之间的航线尤为繁忙，多艘船只频繁往来，成为温州对外联系的生命线。例如，招商局的“海安号”蒸汽船多次被报道直航温州，如（《编译》，第5、6、31、34、42、43、58篇）^[4]的报道均提及“海安号”往返温州与上海，或从温州抵沪。这些频繁的往来不仅承载了温州与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之间的物资交流，也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和信息的传递，是温州融入全国乃至国际经济网络的重要通道。

除了“海安号”，中国航运公司的“温州号”蒸汽船也频繁出现在报道中，其航线覆盖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等长江沿线港口与上海之间，并途经温州。例如，（编译第4、8、9、10、19、21、26、28、33、37、38、40、41篇）^[4]的报道都印证了“温州号”作为连接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的重要纽带。1935年6月16日报道，浙赣铁路杭江段与杭温公路开通直达运输，温州港与内陆交通网络进一步衔接^[4]，说明温州港不仅依托水路，还通过陆路与内陆联动，强化其区域交通枢纽地位，体现“港口—腹地”经济网络的扩展。

这些都表明温州不仅是沿海贸易的重要节点，更是通过长江航线与中国内陆腹地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温州的物产能够输送到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能从内陆获取所需资源。

2.3 航运安全与风险

尽管航运活动频繁，但近代温州的航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这在《大陆报》的报道中得到了充分揭示，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两大方面。这些风险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也对人员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是温州航运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阴影。

自然灾害方面，台风和浓雾是当时中国沿海航运的常见威胁，温州航线亦不例外。1931年8月11日报道，一场强劲的台风导致中国沿海多艘船舶滞留上海港，其中“维桑号”蒸汽船不幸在温州附近海域搁浅（《编译》，第75篇）^[4]。这起事件不仅造成了船只的损坏和货物延误，也反映了当时航运技术和气象预警能力的局限性。恶劣天气和复杂水文条件引发的事故，凸显了近代航运的脆弱性，以及对航运公司和地方政府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巨大挑战。

人为因素方面，海盗活动和船员管理问题也对航运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1931年11月10日,《大陆报》报道了“广济号”蒸汽船在温州附近遭遇海盗劫持的恶性事件,船上人员不仅被抢劫,甚至有乘客因此受伤(《编译》,第14篇)^[4]。这表明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问题依然严峻,这些不法分子对过往商船构成直接威胁,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业航运秩序,增加了运输成本和风险。此外,船员管理和船舶维护方面的问题也引发了关注。1931年8月22日,上海温州同乡会向招商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解雇“海安号”船长,理由是其年事过高且脚部有疾,无法有效应对紧急情况,并且该船长习惯走外海航线,导致船只在风暴中规划失当,险象环生(《编译》,第25篇)^[4]。这起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航运公司在人员任用和安全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疏漏,也体现了地方同乡会等民间组织对家乡航运安全和同胞利益的积极维护,侧面反映了社会力量对航运业的监督和影响。

这些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无疑增加了近代温州航运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它们共同说明了近代温州航运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挑战以及社会治安的困扰是近代温州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克服的障碍。

3 工业转型与实业发展: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3.1 传统手工业的维系与挑战

近代温州的工业发展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新兴工业并存的局面。尽管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日益加剧,但温州传统手工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农产品加工和手工艺品领域。然而,这些传统产业也面临着来自现代工业产品和战时经济政策的双重挑战。虽然《大陆报》的报道直接提及温州传统手工业的具体细节较少,但从侧面反映了其面临的困境和转型压力。例如,1938年6月9日温州当局因战时需要而禁止奢侈品进口的政策,其中可能包含对手工制品的需求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时经济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也可能间接影响到依赖内需的传统手工业(《编译》,第1篇)^[4]。这种政策导向使得传统手工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迫使其寻求转型或面临淘汰。

与此同时,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尝试也体现在报道中,预示着温州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方面的努力。1935年12月23日,报道提及温州地区正在积极发展火鸡养殖业,并计划将这些火鸡出口到上海市场(《编译》,第13篇)^[4]。这显示了温州在农产品生产方面寻求外销市场的努力,也反映了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向商业化、出口导向型转变的趋势。这种尝试虽然在当时可能规模不大,但其背后蕴含着温州在传统农业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的愿望,试图通过发展特色农产品来参与更广阔的市场竞争,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3.2 新兴工业的萌芽与困境

近代温州也尝试发展新兴工业,但其进程充满波折,反

映了当时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普遍性问题。造纸业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体现了地方资本对现代工业的积极性与现实困境的矛盾。1933年10月2日《大陆报》报道,温州计划建造一家大型造纸厂,由当地银行家和商人共同投资,预计耗资30万元,建成后日产10吨纸张,并计划从英国进口先进机器设备(《编译》,第7篇)^[4]。这一宏伟计划表明温州地方精英对发展现代工业的强烈愿望和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需求,希望通过工业化来提升地方经济实力。然而,仅仅在12天后,即1933年10月14日,该计划就被报道因“时机不成熟”而搁置,主要原因是缺乏充足的资金和必要的技术人才(《编译》,第41篇)^[4]。这揭示了近代中国地方工业发展普遍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和人才匮乏等瓶颈,即使有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这些结构性障碍。

而后,根据1935年6月9日报道,造纸厂选址温州因交通便利且靠近原料产地,由英国专家起草规划(《编译》,第121篇)^[4]。1937年4月24日报道,温州造纸厂确定官股150万美元、商股170万美元,并计划申请英国庚子赔款贷款400万美元(《编译》,第124篇)^[4]。1937年4月30日报道,温州现有纸张质量优于瑞士进口品,拟用英国设备提升产能,并拟通过英国庚子赔款贷款购置英国设备,计划全部聘用中国工程师(《编译》,第98篇)^[4]。这些与1933年搁置的计划形成对比,体现工业化尝试的持续性,也说明了本土产业在与外资竞争中的优势,以及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升级的诉求。

即便如此,温州在其他工业领域的不断尝试,预示着其工业发展的潜在方向。例如,1932年1月2日报道,温州地区发现了新的煤矿,预示着当地能源工业发展的潜力(《编译》,第74篇)^[4]。虽然报道没有详细说明煤矿的开采和利用情况,但这一发现无疑为温州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自然资源基础。煤炭作为近代工业的“血液”,其发现对于温州发展重工业或能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战略意义。1935年10月26日报道,官方计划在温州设立陶瓷分厂,依托本地资源发展日用品与工业瓷器(《编译》,第112篇)^[4]。这些记载说明温州在轻工业领域的多元化尝试,造纸厂、煤矿、陶瓷厂等共同构成早期工业化的多元图景;这些动态也揭示温州商业在动荡中的韧性与适应性。

3.3 商业活动与市场变迁

温州的商业活动在近代也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迁,呈现出区域性商业中心的特点,其市场受航运、战争和政策等多方面影响。《大陆报》的报道反映了温州作为物资集散地和贸易枢纽的地位,以及其商业生态在动荡时期的适应与调整。例如,1938年6月9日温州当局禁止奢侈品进

口的措施，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商业结构和消费市场，促使商业活动向必需品和战略物资流通倾斜（《编译》，第1篇）^[4]。这一政策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也是为了限制非必需品的进口，以节约外汇，支持抗战。这种政策导向使得温州的商业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从自由市场转向了受管制的战时经济模式。

此外，商业纠纷和贸易往来也时有报道，反映了商业活动的复杂性和温州商人活跃的商业网络。1933年11月14日，《大陆报》报道提及温州商人在上海的商业活动，以及他们与上海商业界的紧密联系（《编译》，第67篇）^[4]。这表明温州商人不仅局限于本地市场，更积极参与到更广阔的商业网络中，上海作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对温州的商业发展具有重要的辐射作用。这种跨区域的商业联系，使得温州的经济活动与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紧密相连。这些商业活动不仅包括商品流通，也涉及金融往来和商业合作，共同构成了近代温州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温州商人可能通过上海获取国际商品信息，引入新的商业模式，或者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周转。尽管面临战乱和政策限制，温州商人依然展现出其特有的商业韧性和灵活性，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求发展机遇。

4 温州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分析

通过对《大陆报》1925-1938年间温州相关报道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温州早期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历史图景。

4.1 港口驱动型转型：外向型经济的形成与局限

《大陆报》中大量关于温州航运贸易的报道，清晰地揭示了温州早期现代化是典型的“港口驱动型转型”。温州开埠后，其地理位置优势被激活，港口成为连接内外市场的关键枢纽。例如，1936年2月19日“温州号”从汉口载“大量货物与乘客”抵沪（《编译》，第4篇）^[4]，印证了温州依托港口形成“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这种以港兴商的模式，使温州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浙南与上海、香港的贸易枢纽，不仅是运输节点，更是技术、人才、信息的交汇枢纽。频繁的船舶往来，如“海安号”和“温州号”在温州、上海、长江沿线港口间的穿梭（《编译》，第5、6、8、9、10、19、21、26、28、31、33、34、36、37、38、40、41、42、43、58篇）^[4]，表明温州通过航运深度融入了区域经济网络。

然而，这种港口驱动的现代化也存在其局限性。首先，港口功能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时期。1938年6月9日温州港的严格进出限制和奢侈品禁运，以及1938年6月28日客运服务的无限期暂停（《编译》，第1、22篇）^[4]，都表明港口在战时更多地承担了军事和战略物资转运的功能，其商业自由度受到极大限制。其次，航运安全问题频发，

如台风、浓雾导致的船只搁浅和沉没（《编译》，第23、30、75篇）^[4]，以及猖獗的海盗活动（《编译》，第14篇）^[4]，都增加了航运成本和风险，阻碍了港口潜力的充分发挥。这些因素使得近代温州的“外向型经济”在动荡时期显得脆弱，难以持续稳定发展。

4.2 民间资本的主导性与工业化尝试

与中国其他沿海城市相比，温州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民间资本的主导性尤为突出。温州商人历来具有强烈的商业冒险精神和资本积累能力。在工业发展方面，这种民间积极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33年10月2日温州计划建造大型造纸厂，由当地银行家和商人投资，并计划从英国进口机器（《编译》，第7篇）^[4]，这充分体现了民间资本对发展现代工业的热情和对西方技术的渴望。这与当时一些由官办主导的工业项目形成对比，显示了温州独特的民间活力。1935年3月29日报道，永嘉商会要求招商局替换老旧的“海燕号”，认为其存在安全隐患（《编译》，第96篇）^[4]，也体现出民间力量对航运安全的监督与对现代化设备的诉求，强化民间资本在推动行业进步中的主动性。

5 《大陆报》视阈下温州早期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溯源

温州港作为开放门户和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关键，其战略地位在任何时期都不容忽视；民间资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激发和引导民间资本对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现代化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开放与保守的复杂交织，理解这种二元性有助于处理社会转型中的矛盾。

5.1 开放包容的商业传统

《大陆报》中频繁的航运记录，实则是温州人开放基因的生动注脚。从“海安号”“温州号”往返于温州与上海、长江沿线港口的常态化运营，到温州商人活跃于上海商业网络，可见其突破地域限制、主动对接外部市场的意识。这种“走出去”的倾向，与当代温州经济的“外向性”特质形成跨越百年的呼应，印证开放包容是温州商业文化的核心基因。

5.2 民间自主的创新活力

《大陆报》中民间资本的探索恰是鲜活例证。如1933年温州商人计划自建造纸厂，虽因资金、技术问题搁置，却展现了不依赖官方、自主求变的闯劲；1935年火鸡养殖业的外销尝试，则体现了传统农业向商业化转型的创新思维。这种民间自发的实践，与“四千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温州现代化进程中持续的内生动力。“四千精神”作为温州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温州不同发展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根源可追溯至近代民间资本在实业发展中的自主创新实践。

5.3 灵活适配的文化智慧

面对外来影响，温州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展现出灵活调

适的文化智慧。《大陆报》虽未直接记载本土文化对外来元素的改造，但从航运贸易中“进口工业品—出口农产品”的双向流动（如“温州号”货物流向记录），可窥见其对外部资源的选择性吸收。这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使温州在早期现代化中既保持本土根基，又能借力外来因素。温州在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对待外来文化还是技术，都展现出这种灵活调适的特点，正如永嘉学派所强调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温州现代化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大陆报》作为外媒这一他者视角，仍然是有局限的。对温州社会的记载集中于城市与港口，缺乏其他的视角，如乡村视角。未来研究可结合中文地方文献、口述史料等多元资料交叉验证；针对特定领域开展专题研究；拓展时间维度，考察温州早期现代化与后续发展的内在联系，为当代区域发展提供更具历史深度的参考。

综上，《大陆报》中的温州叙事，不仅是地方史研究的

珍贵补充，更揭示了近代中国沿海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本土性、拥抱开放性”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至今仍在温州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延续。

[参考文献]

- [1]鲍立娟.《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研究(1911-1916)[D].上海:上海大学,2020.
- [2]何传启.什么是现代化[J].中外科技信息,2001(1).
- [3]胡珠生.温州近代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 [4]The China Press(1925-1938)[EB/OL].

作者简介:

金黎希(1984.10-),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汉翻译。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近代在华英文报纸〈大陆报〉的编译与温州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4WSK078YB。